

现代中东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与特征

王 泰

摘要: 二战后, 中东经历了民族解放独立运动和社会革命, 现代化进程向全面化、纵深化方向发展, 地区经济合作和区域化逐渐加强, 中东地缘政治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和重要。巴以冲突持续不断, 中东问题呈现出复杂化、长期化趋势。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扩散在国际意识形态及国际政治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形成所谓“文明冲突”六个趋势与特征。

关键词: 中东; 历史特征; 历史趋势

在二战后的世界历史进程中, 中东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油气资源及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进入 21 世纪, 回顾和总结战后 50 多年中东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清战后中东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深刻了解和把握未来中东局势发展的走向。

一、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和社会革命是中东国家战后进入历史发展新阶段的基本前提。

二战以人类文明惨遭亘古未有之厄运为代价摧毁了殖民主义世界体系, 斯塔夫里亚诺斯说: “1945 年后的 20 年间, 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的武装斗争摧毁了那些仅在几年前还似乎是牢不可破、永久不衰的欧洲大帝国。”^[1] 中东人民摆脱奴役, 争取独立、自由和幸福的希望之火被重新点燃, 各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成为战后初期中东历史发展的亮点。

40 年代前, 中东形式上独立的国家主要有埃及、沙特、伊拉克、北也门、阿曼、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 仅占中东国家的 1/3。二战中, 法国为得到叙利亚、黎巴嫩的支持被迫同意结束委任统治, 允许两国独立, 从而揭开中东人民脱离殖民主义体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序幕。40 年代, 黎、叙、约先后脱离法、英统治独立。与此同时, 世界惟一的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国也于 1948 年 5 月 14 日建立, 犹太民族从此走上复兴之路。

50 年代, 利比亚、苏丹、摩洛哥、突尼斯独立。从社会革命的角度而言, 伊朗、埃及和伊拉克 3 国影响巨大, 其中又以埃及为最。1951 年, 伊朗国会通过了石油国有化法案, 组成了以摩萨台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府。摩萨台实施石油国有化政策, 打击了外部势力尤其是英国在伊朗的石油利益, 挽救

伊朗经济; 对内实施较激进的改革措施, 因遭到英、美的联合抵制以及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失败, 但 20 年之后 (1973 年) 伊朗终于实现了石油国有化的目标。1952 年 7 月 23 日, 埃及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成功, 推翻了法鲁克王朝, 1953 年埃及宣布成立共和国。1956 年, 纳赛尔当选为埃及共和国总统。埃及人民为实现经济独立掀起规模浩大的国有化浪潮, 其中, 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影响巨大; 纳赛尔总统还领导埃及人民进行了震惊世界的抗击英、法、以三国入侵的苏伊士运河战争, 并取得胜利。埃及的七月革命和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胜利, 极大地鼓舞了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迎来了 1960 年的“非洲年”。^[2] 1958 年 7 月 14 日, 卡塞姆发动政变, 推翻了伊拉克费萨尔国王的统治, 宣布建立伊拉克共和国, 成立了以卡塞姆为首的包括众多政党和左翼人士组成的新政府。新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改革, 适应了伊拉克的社会需求, 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在当时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影响很大。

60 年代, 塞浦路斯、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南也门先后建立起了独立民族国家, 其中阿尔及利亚的反法民族解放运动最为著名。早在 1954 年 10 月, 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武装起义, 1958 年 9 月, 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开罗成立, 经过长达 7 年的抗争, 于 1961 年 7 月 3 日宣告阿尔及利亚独立, 结束了法国 130 多年的殖民统治。这场运动是二战后中东北非地区持续时间较长, 斗争强度和规模较大的一次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 对中东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70 年代, 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也宣布脱离英

国独立。至此,中东的民族独立运动基本完成。需要指出的是,1988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阿尔及尔宣布建国并且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欢迎,到该年底,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已达90个^[3]。但巴勒斯坦大片领土仍被以色列占领,巴人合法的民族权利问题并未解决,故一直是困扰整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二、现代化进程向全面化、纵深化方向发展是战后中东国家历史发展的实际内容和主要成就。

如果说二战前,中东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民族解放和自由独立,那么战后,当民族解放和自由独立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从近代以来一直时断时续的现代化进程便逐渐上升为中东社会变革的主流趋势。中东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入发展的新时期,可谓真正的“历史性的转折”^[4]。二战后初期,整个中东地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很低,40%居民营养不良,30%的人忍饥挨饿,许多国家的文盲占总人口90%以上。但是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70年代初西方殖民主义者被最终逐出中东以后,中东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今,中东已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发展成为以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为主的地区之一。

在经济建设方面,中东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经济结构得到初步改善,出口能力明显增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东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埃及、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阿曼等10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约是1965年的28倍。^[5]截至2000年,中东20国(不包括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和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达到18279亿美元。经济增长率大多维持在2~3%,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北非国家增长率甚至达到5%以上。长期以来,中东大多数国家产业结构单一,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为此,各国政府十分重视现代工业,尽可能建立较完善的本国民族工业体系,以石油能源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使这一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现在中东各国经济仍然存在着很大差异,特别是产油国和非产油国的经济差别明显,加上人口的急剧增加(中东是世界上人口数量增加最快、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平均达到2.46%),使得经济增长的成就和增长的人口相抵消。

中东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前的情况相比,今日中东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其社会面貌和物质生活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以前落后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截至2000年,除苏丹(930美元)和也门(740美元)外,中东多数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都已超过2000美元,超过1万美元的有科威特、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随着对教育的重视和大量投资,中东国家的成人识字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平均已经达到70%,义务教育年龄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从5岁到16岁不等,不少国家还实行免费教育。从占有资讯方面来看,中东每35人拥有一部电话,每8.7人拥有一台电视,每1000人拥有90份报纸。此外,在城市化、饮食结构、价值观念、妇女地位、社会娱乐等各个方面,中东国家的社会变化都是相当大的^[6]。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不仅成为战后中东历史进步的标志,也是推动它继续向前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三、中东国家的民主政治在逐步推进。

20世纪初至70年代前,中东国家在政治生活中盛行的依然是个人权威、家族政治和一党制。从70年代以来,中东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变革,出现了政治民主化的趋势。现在宪政选举、议会制、政治协商制、多党制等形式已在埃及基本建立。伊朗虽是伊斯兰神权共和制国家,但在整体和形式上设立了总统和总理,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1983年,长期一党执政的土耳其开始允许更多政党活动,重申所有公民均有权从事政治活动。冷战结束后,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将政治民主化向全球推广,掀起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另一方面中东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人民要求改变现状、争取民主政治权利的愿望上升,一些国家已实现了领导人权力的顺利交接,特别是新生代领导人上台执政,认识到要巩固统治地位,政治改革势在必行,使中东的民主化浪潮有所发展。军事政变和军人干政的现象显著减少,军人独裁政权色彩逐渐淡去,有的还政于民,有的也实行政治开放。伊朗的宗教领袖逐渐脱离政权的实际操作,总统已经成为国家大政方针的主要设计者和执行者,至少政教分离的趋势已经出现。土耳其的政治体制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在中东伊斯兰国家里,是民主化、法制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以色列作为中东唯一实行西方议会制的国家,在1996年又进一步将总理选举由间接改为直接选举,政治民主化向前迈进一大步。约旦从1989年实行

政治多元化,科威特 1992 年恢复了解散多年的议会。像巴林、阿曼、沙特阿拉伯等传统势力较强的君主国也都开始实行程度不一的民主改革。但是,总体上看,中东的政治民主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稳定,民主化、法制化程度不高,政教关系复杂等特点,在现代化制度层面上,中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加强地区经济合作和区域化是战后经济全球化挑战下中东联合的必然要求。^[7]

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全球化并驾齐驱,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二战以后,中东国家的经济合作由于地区形势动荡、战争频仍、内部分歧严重、经济互补条件差以及缺乏资金等种种原因而发展缓慢。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加强地区经济合作和建立经济一体化机制,无疑是中东迎接世界经济竞争的必要途径。参与地区经济合作,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一体化经济的资源、市场、人才和信息来自我发展,加快现代化进程,而且可以防范和弱化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与危机。

1945 年,在埃及的倡议下,21 个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组成了阿拉伯联盟,旨在开展合作,推动阿拉伯政治和外交团结并促进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后一目标导致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协议以及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诞生。当年,阿盟成员签署了联合防御和经济合作条约,在条约框架下成立了由各国外交部长组成的理事会负责经济活动。阿盟宪章和合作条约促成了五六十年代阿拉伯国家经济协调合作,主要是贸易、货币、投资和劳务合作的法律框架。1957 年,经济理事会达成了阿拉伯经济统一协定,1964 年成立阿拉伯共同市场,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利比亚、苏丹、也门、黎巴嫩和毛里塔利亚先后加入。由于成员国之间未能就允许自由流动的商品种类达成一致,该组织没能实现既定的目标。1980 年阿盟历史上第一次召开了阿拉伯经济首脑会议,会议要求阿盟经济社会理事会重新审定所有现行经济协议。1981 年,理事会通过促进和发展阿拉伯国家间贸易交流协定,于 1982 年 11 月 16 日生效。阿盟通过贸易谈判委员会对协定的实施进行监管,管理贸易谈判规则以及成品和半成品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但是,促进协定并没有规定时间表,故也未达到预期目标。

1989 年,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和毛里塔利亚签署条约,建立了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马盟条约的宗旨是加强兄弟关系,促进社会

进步和繁荣,保护本地区权益,在所有领域采取共同政策并逐步实现人员、货物、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条约的实施进程模仿欧盟的进程,其组织结构也和欧盟类似。但马盟从一开始就问题不断,自 1995 年以来未举行过首脑会议,活动也基本停滞。

20 世纪 80 年代较为成功的合作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海湾合作委员会于 1981 年 5 月 25 日由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签署成立。该组织的宗旨是加强成员国在一切领域内的协调、合作和一体化;加强人民的联系,在经济、财政、农业、工业等各领域进行政策协调,促进科技进步和私营部门合作。同年 11 月各国签署了统一经济协议,目的是实现成员国间的自由贸易并建立关税同盟。1999 年 11 月,第 20 届首脑会议在利雅得举行,批准了统一关税协议,决定于 2005 年 3 月 1 日开始实行统一税制。

20 世纪 90 年代,阿拉伯世界经济一体化热潮再起。1993 年 12 月第 58 届阿拉伯经济统一理事会会议上强调了建立阿拉伯国家自由贸易区的必要。1995 年 9 月阿盟经社理事会第 56 次会议上,埃及提出建立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的建议。1996 年开罗泛阿首脑会议决定,通过建立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代替名存实亡的阿拉伯共同市场来重启阿拉伯贸易和经济一体化进程。1998 年 1 月 1 日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GAFTA)正式生效。它主要是通过减税(享受贸易自由化优惠的商品关税每年降低 10%,不得征收额外关税,也不得施行非关税壁垒)来促进贸易,督促成员国在服务、技术合作、科技研究、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机制协调、法律和政治等方面进行磋商。但由于地缘经济政治等因素,GAFTA 未能按计划顺利实施。目前已有 14 个国家执行了降税计划,它们是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黎巴嫩、约旦、摩洛哥、伊拉克和 6 个海湾国家,这些国家间的贸易占全部阿拉伯国家间贸易的 90%以上,它们的对外贸易也占阿拉伯国家对外贸易的 90%以上。

1991 年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后,中东和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巴勒斯坦和约旦相继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阿以关系出现重要转变。中东北非地区国家普遍希望借此机会加强经济交往与合作,振兴国家经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1994 年中东北非首脑会议(MENA I 或卡萨布兰卡会议)标志着阿拉伯和以色列官员第一次正式讨论贸易、投资和合作项目。在会上,美国建议实施中东地区合作计划,将

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纳入区域经济合作体系,作为中东和平进程的一部分。会议基本采纳了美国的建议。MENA II 在安曼举行,决定建立地区经济发展工作小组,以解决贸易、基础设施和旅游的问题。开罗的 MENA III 受中东和平进程影响,由首脑会议降格为经济会议,举行了多场专题研讨会和项目交流会,开始筹办中东北非开发银行。MENA IV 在多哈举行,因中东和平进程严重受挫受到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抵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如前所述,中东北非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可谓时断时续,领导人往往是出于政治目的参与,在操作过程中遇到很多实际困难,因此中东北非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距离原定目标还很远。

五、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夺到后冷战时代中东政治格局的演变,显示出中东的地缘政治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和重要。^[8]

从地缘政治和国际能源的角度看,中东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东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交汇处,处于东半球大陆的中心。中东拥有世界最重要的海峡和运河,沟通了“三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四海”(黑海、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使欧亚海路可以不再绕道好望角,大大缩短了航程,节省了时间、燃料和费用。中东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沟通印度洋与大西洋,联接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枢纽,进而成为自古以来大国的必争之地。二是中东有“世界油库”之称,中东的石油年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34%左右,销售量占世界总销售量的 65%左右,是世界能源的供给中心,也是西方国家的主要能源供给基地。中东石油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影响,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两次全球性石油危机中,以及在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而且,尽管中东石油已经开采了一个世纪,但按目前的生产速度,中东已探明的石油还能开采 100 年以上,而世界其他地区平均只够开采 20 年左右。在世界经济更加依赖中东石油的情况下,中东的地位和作用在 21 世纪会变得愈加突出和重要。

冷战时期,中东的基本格局是西部阿以对峙、东部两伊抗衡,美国和苏联为各自在中东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展开激烈的对抗与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大国在中东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意大利完全被逐出了中东,英国、法国在中东的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了,而美国、苏联势力开始全

面进入中东。从战后初期到 50 年代中期,美国凭借它的军事实力,开始向中东地区渗透,目的是排挤英、法势力和建立包围、遏制苏联的所谓“北层防线”。苏联在这一时期的中东政策,是利用中东持续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军援”、“经援”为手段,向中东大肆扩张,取得了惊人的进展。而美国则一度身陷越南战场,无力顾及中东,处境较为被动。从 70 年代初~70 年代末,美国在亚洲收缩,脱身越南、重点保卫欧洲及其侧翼。1973 年十月战争后,美在中东地区大力反击苏联势力,把埃及拉向自己一边,独揽中东和平进程,使苏联连连受挫。从 80 年代初~90 年代初,由于埃以媾和,阿拉伯世界陷入分裂局面,阿以之间不可能再爆发大的战争,美国在中东的地位更加巩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力下降,在全球及中东事务的影响下降,美苏争夺中东的历史已经结束。^[9]

冷战结束后,美国确立了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对中东的影响进一步增强,急欲形成美国独霸中东的局面。特别是海湾战争使美国军事力量第一次进驻海湾。近 15 年来中东的战略格局是由美国主导下的“西促和谈、东遏两伊”,其中美国与伊拉克是直接的军事对抗。本世纪初的二次战争,特别是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以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由进行的战争,对于中东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现在还在延续。当前,未来美国仍然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外来地缘政治因素,而中东地区本身的地缘战略格局也由于美国而发生很大的变数。^[10]2003 年底,长期和美国对抗的利比亚主动表示放弃核计划,重归国际社会。伊朗去年也表示接受国际武器核查。中东的大国埃及和伊朗开始改变以前的敌对态度,进行了领导人会谈,甚至传闻叙利亚和以色列也在进行秘密会谈。这些表明,在后冷战时期,中东的地缘政治地位依然敏感、突出且重要。美国、俄罗斯、欧盟以及日本对中东的争夺将会更为激烈。

六、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冲突、动荡持续不断,中东问题呈现出复杂化、长期化的趋势,使中东成为世界热点。

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从 19 世纪末就开始的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对抗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阿以矛盾不断升级,中东局势愈加动荡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已历时近 60 年,其间双方发生了五次大规模的战争,经历了 25 年曲折反复的和平进程。但到

目前为止,冲突双方以及国际社会仍未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中东问题不仅显示出长期化趋势,而且也更为复杂化了。^[11]

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开进巴勒斯坦,开始了第一次中东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联合国分治计划中的阿拉伯国家尚未出生就被以色列、埃及、约旦三国瓜分,近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沦为难民。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在英、法的支持下以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及封锁蒂朗海峡为借口对埃及发动进攻,英法军队也参与战事,埃及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这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战争最终以英法失败而结束,英法在中东的殖民统治因此崩溃。以色列达到了战争目的,但在外交上陷于世界的谴责之中。埃及不仅捍卫了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而且从此在阿拉伯世界声名大振,成为中东反以的领袖和先锋。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突然袭击,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经过六天战争,三个阿拉伯国家遭到屈辱的失败,加沙地带和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被以色列占领。此后,双方围绕着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虽然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解决土地问题的242号决议,在当时却遭到了双方的拒绝。“六·五”战争称为阿以关系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阿以争端的内容发生变化,此前,双方争议的中心是以色列是否有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即犹太人的民族权利问题;此后,收复“六·五”战争中被占领的阿拉伯国家领土及恢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权益成为阿拉伯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经过长期周密的准备,突然向以色列发起了收复失地的进攻,第四次中东战争打响。这次战争是阿以对抗中最惨烈的一次,双方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战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也迫使双方开始考虑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从而对以后和平进程的启动产生重要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战争中,阿拉伯产油国使用了“石油武器”,沉重打击了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造成战后西方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也显示了阿拉伯国家团结合作的力量。1982年6月6日,以色列以其驻英大使遇刺为由,对黎巴嫩发动了突然袭击,被称为第五次中东战争。战争给黎巴嫩人民带来空前浩劫,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也付出巨大代价,其成员被遣

散到周边8个阿拉伯国家。

从1978年开始,中东进程已经走过了25年的历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开始,80年代的停滞与徘徊,到90年代初中期的高潮以及此后的再度低落,最近五年则是局势进一步动荡,和平进程面临夭折的阶段。和平进程开始以来,阿以双方经过多次谈判,国际社会也积极进行斡旋,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仍是通向和平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例如东耶路撒冷地位问题、被占领土及边界问题、水资源问题、犹太人定居点问题、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打击双方极端势力的反对和破坏问题等。^[12]上述每一个问题都不是孤立的,具有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影响。边界问题涉及到归还领土多少和水资源问题,领土必然涉及到建国,建国则涉及到首都、人口、地理、经济、安全等问题,环环相扣,解决难度之大可以想象,更何况它们都是双方谈判不可回避的老问题。在坎坷艰辛的和平进程中还不时出现人们难以预料的新问题,例如以色列领导人遇刺、巴勒斯坦私运军火、阿拉法特在拉马拉官邸被困、以色列修建隔离墙和撤出加沙的单边行动计划、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不稳以及美国任其边缘化等等,都是和平进程中随时可能点燃的导火索。

总的来讲,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中东问题有着深刻复杂的民族、宗教、国际、历史等因素,历时已百多年之久,贯穿19、20、21三个世纪,这就使我们必须正视解决问题的长期性和艰难性。25年的和平进程体现了在危机中存在着希望,在缓和与中存在着矛盾这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它表明和平进程尽管会出现多次僵持,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却始终在前进,某个历史时期还可能达到高潮;同时,它又提醒人们,和平进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间要付出财产、时间甚至几代人的生命。只有阿以(巴以)双方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斡旋和干预下,真正有勇气坦诚地面对危机,彼此特别是占领方以色列作出必要的妥协,和平的光明才可能降临。

七、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扩散在国际意识形态及国际政治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中东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特殊地位,还表现在它独特的历史、文化方面。中东素有“人类文明的摇篮”之称。伟大的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波斯文明以及后来的希腊罗马文明都在这个地区诞生、成长,也曾碰撞和交流。这些人类文明

为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富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东曾出现过众多的帝国,如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中东还是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位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地。千百年来,中东一直是宗教势力最强大、宗教色彩最浓厚的地区,不同宗教之间一再发生冲突,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中东的三大宗教中,伊斯兰教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全世界具有巨大影响。现在有 28 个国家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有 35 个国家的穆斯林人数超过居民总数的一半,全世界的穆斯林人数已超过 10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 1/6 以上,仅每年从世界各地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就达 200 万以上。但在穆斯林内部却长期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教派斗争。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的斗争由来已久。战后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穆斯林内部的教派斗争渗入到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领域,教派斗争演化为争夺国家政权和地区事务主导权的斗争,成为中东局势恶化和战乱频繁的一个根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它推翻了巴列维王朝,代之以由宗教领袖主政的伊斯兰共和国。其后在伊朗政局变动的冲击和影响下,在敏感多事的中东地区乃至整个幅员广阔的穆斯林世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带有群众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大因素之一。目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已遍布全球,在中东比较著名的组织有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阿富汗前塔利班组织等等。这些组织以松散的形式联合在一起,成为许多地区和国家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势力。他们纷纷打着复兴伊斯兰为旗号,要求回到《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始教义上去,按照伊斯兰教法行事,重新建立一个政教合一,严格遵循伊斯兰传统价值的社会,在整个世界政治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有密切关系,但把伊斯兰复兴运动仅仅同现代化联系起来,还不能完全解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当代性、伊斯兰世界性乃至全球性。这场融政治、宗教、文化与经济于一体的社会运动,其“高涨并非由社会贫困所激发,而国家的繁荣也未必能遏制运动的蔓

延”^[13]。笔者认为,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独特而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在于它是面对全球化运动扩张在伊斯兰这个独一无二的社会传统中,自发产生并构建的一道抵御西方强势政治、文化冲击的防波堤,只是这道防波堤表现出来的不是被动消极防御而是积极主动出击。从时间上来说,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与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有着内在深刻的一致性,而不是偶然的重合。从形式上来说,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以民族化、本土化对抗西方化、美国化(当然全球化不是西方化,更非美国化,但在中东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如此);究其本质则是反全球化,伊斯兰复兴运动所表现出的极端行为如屡屡发生的绑架、袭击外国游客、制造恐怖事件,显然不利于国家全面参与全球化。^[14]但伊斯兰复兴运动并没有改变历史上形成的中东国家总体上软弱和对西方的依赖,以至于有学者形容伊斯兰复兴的 20 年也是“失去的 20 年”。^[15]

伊朗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对伊斯兰教的看法。1979 年之后,在西方的大众传媒、学术著作、政治言论、外交决策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词几乎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宗教、学术、政治术语。一时间,“伊斯兰威胁”从神话变为现实^[16]。西方部分舆论认为,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以及伊朗革命后采取的种种反西方的政策,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全面对抗的一个信号。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冷战时期东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1993 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源是文明方式的冲突,这一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成为未来世界的主战场。他甚至预言,21 世纪国际间的对抗,将是以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西方与以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为代表的东方之间的冲突。^[17]面对“9·11 事件”和伊拉克战争,我们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承认该命题的现实性及客观性。历史上,在中东地区文明的冲突一直是存在的(希腊化、十字军东征、阿拉伯征服、奥斯曼的扩张、近代的殖民主义等),那么在一个日益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文明确实是使自己成为自己而不成为别人的最重要标志,西方如此,伊斯兰也如此。在这方面,近年来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文化自觉”已经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亨廷顿的预言是否(下转第 56 页)

(上接第41页)正确姑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文化冲突将是一个重要因素。呼唤文明的对话、交流、沟通、合作是21世纪全人类共同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

注 释:

- [1]【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译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64页。
[2]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3]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403页。
[4]详见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5页。
[5]根据Global Studies: Middle East. 8/E. 2000所提供的数字综合计算,不包括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和阿富汗。
[6]关于中东的政治民主化问题,详见陈德成主编的《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7]关于中东地区的全球化与区域化还可参见:Regionalization in a Globalizing World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Forms, Actors and Processes, Edited by

Michael Schulz, Fredrik Soderbaum and Joakim Ojendal, New York, 2001.

- [8]Martin Sicker, The Middle Ea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2001.
[9]姚大学,王泰主编《中东通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2-439页。
[10]据新华社耶路撒冷,2004年1月15日。
[11]关于阿以冲突,可以详见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
[12]详见姜桂石、王泰:《中东(巴以)和平进程:问题与前瞻》,《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底4期。
[13]秦朵:《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与民族宗教运动的复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4期。
[14]详见拙文:《全球化挑战埃及:历史、问题与对策》,载《阿拉伯世界》2001年第3期。
[15]东方晓:《伊斯兰复兴:失去的20年》,载《西亚非洲》2001年第4期。
[16]【美】J.L.埃斯波西托著:《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7]关于“文明冲突论”详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